

# 新世纪以来我国公民参与研究的回顾与评析

文 / 顾训宝 杨彬彬

**摘要：**随着我国公民参与实践的快速发展，对公民参与的研究成果也在稳步增多。学者们从宏观和微观两条研究路径，对公民参与的涵义、缘由、价值、理论基础、参与方式等进行了广泛研究，并针对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总起来看，新世纪以来，我国公民参与研究呈现出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方法日益丰富的特点，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今后仍需在构建本土化理论、加强案例和定量研究、增强问题意识、拓宽研究领域等方面继续努力。

**关键词：**新世纪以来；公民参与；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6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6)05-0122-07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公民参与实践的快速发展，对公民参与的研究成果也在稳步增多。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任务，公民参与问题更加升温。笔者以“公民参与”为篇名关键词，对“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进行模糊检索，2001年，与“公民参与”相关的文献共有29篇，其后逐年快速增长，到2008年已超过400篇，以后每年始终稳定在400篇左右。因此，对新世纪以来我国公民参与研究情况进行系统梳理，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公民参与状况，也有助于学界对之进行深入研究。以下分几个方面对相关情况加以介绍，最后进行简要的评析。

## 一 公民参与的路径与方法

从研究路径和方法来看，现有研究主要存在宏观和微观两条研究路径。

### （一）宏观研究路径

宏观研究路径一般是把整个公民参与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从制度—结构视角来分析公民参与产生的缘由、主要特征和价值等。学者们多采用理论研

---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服务型政党建设路径构建”（2014M561140）；曲阜师范大学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列宁与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建设研究”（BSQD201206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创新项目；山东省中共党史重点学科规划项目

**作者简介：**顾训宝，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北京市，100009；杨彬彬，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研究生，北京市，100044。

究法、定性分析法等，也有的学者采用定量分析法。

关于公民参与产生的缘由，在宏观研究层面，学者们主要是立足于社会转型的背景，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政治方面，认为公民参与主要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如有学者认为公民参与是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新政推出的。<sup>[1]</sup>也有学者认为，当前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不均，利益分配失衡，社会主义民主事业的发展，都彰显了公民参与的紧迫性。<sup>[2]</sup>还有学者从政府治理视角认为，政府治理模式的演进决定了公共决策体制变革的方向和途径，由此促进了公民参与的发展。<sup>[3]</sup>经济方面，认为公民参与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如有学者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独立多元的经济主体，带来了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以管制为目的传统法制要求已不适应，公民参与成为必然。<sup>[4]</sup>也有学者从民生视角指出，民生涉及到最受人民关注的基本利益，这决定了在寻求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案时必须要有公民参与，同时，公民参与为改善民生提供了平台和渠道，广泛持续有力的公民参与是改善民生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sup>[5]</sup>文化方面，认为公民参与是培养公民文化的需要。而公民文化是一种“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没有公民参与的实际行动，这种文化很难培育。<sup>[6]</sup>社会方面，认为公民参与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由于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新的利益群体不断出现，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如果缺少科学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就影响到社会稳定，甚至会冲垮现有政治体系。<sup>[7]</sup>

关于公民参与的特征，学界主要采用了定性分析方法，通过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参与主体、渠道、内容具有广泛性；二是参与的整体有序性与局部无序性并存；三是参与中的“公意”性取向与“非公意”性取向并存；四是参与的非均衡性；五是公民参与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二元”特征，即公民参与的政治氛围浓厚与参与实践碎片化并存、公民参与的自主性逐步提高与主体性意识仍旧薄弱并存、公民参与的规模不断扩大与

参与范围相对狭窄并存、公民参与的效能不断增强与参与的形式主义并存。另外还有学者将之归纳为政府主导性、公民维权性和媒体驱动性等三个特征。<sup>[8]</sup>

关于公民参与的价值，从宏观方面来讲，学者们主要是从政治、社会、公民等层面进行了分析。在政治层面，公民参与有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助于强化政治体系的代表性和回应性，有助于增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合法性和民主性，有助于政府公平行政和廉洁自律。<sup>[9]</sup>在社会层面，公民参与有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有助于社群意识的形成，有助于多元文化的形成；有助于促进不同利益群体间的交流，有助于促进政府内部的交流，有助于促进不同利益群体和政府间的交流，从而有利于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sup>[10]</sup>在公民层面，积极参与有助于培育公民的责任意识和公共精神，有助于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保障公民权的实现，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sup>[11]</sup>总之，公民参与对于政府、社会、公民都是有益的，能够推进政府、公民以及各利益群体的交流互动。

## (二) 微观研究路径

微观研究路径一般是以某个参与案例为研究对象，从过程—事件视角来分析具体案例的参与过程，以及不同行为主体采取的策略和行为等。

微观研究路径下的案例研究，其具体研究思路一般为先就某一领域的参与实践阐述相关理论，然后引入具体的公民参与案例，叙述案例事件的发生过程，分析该案例中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并结合该案例提出具有一定推广价值的改进策略。

学者们所选取的具体参与案例，一般是当时的社会热点事件，影响比较大。有些参与案例是政府主导的，有些是公民维权性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参与案例中比较典型是浙江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参与式预算等参与实践。如吴玉宗描述了温岭市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公民参与过程；郎友兴以温岭市为例，借助相关数据资料，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公民参与与治理绩效的关联性；陈剩勇以温岭市民恳谈会为例，分析了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公

民有效参与的相关问题。<sup>[12]</sup> 公民维权型的公民参与案例,比较典型的是涉及广东茂名、浙江宁波、福建厦门PX项目以及广州番禺垃圾焚烧事件。<sup>[13]</sup>

## 二 公民参与的理论基础及实践导向

就目前来看,国内学者在研究某一领域的公民参与问题时,其理论基础还多是引介西方的公民参与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参与式民主理论、参与式治理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

### (一) 参与式民主理论

参与式民主理论是从政治学视角来研究公民参与,其实践导向是公民政治参与。但这种政治参与并不局限于代议制民主下的投票、选举等活动,而是一种广泛的直接民主形式,鼓励公民广泛地参与各种类型的决策,提倡培养积极的公民,主张建立参与性社会。其基本实践思路是通过扩大基层社会、地方的参与,为实现更高层次的民主运作提供条件,这也契合当前中国民主政治渐进发展的路径。<sup>[14]</sup>

在西方语境下,参与式民主是因自由主义民主无法积极回应政治社会发展现实而提出的一种新型民主模式,其理论本质上是建立在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核心概念,即政治参与和平等的剖析和重新解读的基础之上的。有学者认为,在参与式民主语境下,公民参与成为构成民主制度的核心要素,参与式民主赋予了行政权力内在合法性、促进了公民参政意识和能力的提高以及推动了行政权力的“善治”。<sup>[15]</sup> 还有学者认为,在参与式民主理论视域中,使得公民参与具有教育公民、整合共同体、制约国家权力的功能。<sup>[16]</sup>

另外,随着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重要形式的重要论断,协商民主成为近期研究热点。而协商民主与参与式民主都是公民参与的理论基础,两者是一种什么关系,自然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陈炳辉、王锡锌等学者认为,协商民主理论是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构成,广义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包含了协商民主理论。<sup>[17]</sup> 陈尧、胡伟等学者认为,协商民主理论和参与式民主理论不是简单的隶属关系,而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协商民主理论

是对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发展。<sup>[18]</sup> 刘训练等学者认为,协商民主理论和参与式民主理论不是简单的继承发展关系,两者同属于共和主义民主理论,相似但也有差别。<sup>[19]</sup>

### (二) 参与式治理理论

参与式治理理论是从行政学视角来研究公民参与,其实践主要集中在参与式财政预算、社区参与式治理、农村参与式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其实践导向是追求行政领域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合理化以及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参与。

关于参与式治理的涵义,目前学界的界定还不一致,陈剩勇认为,参与式治理是指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团体和政府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张紧跟认同西方的“赋权参与式治理”理论,认为参与式治理是指由地方政府培育的旨在通过向普通公民开放公共政策过程以解决实际公共管理问题的制度与过程的总和。赵光勇认为,参与式治理是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的应用与实践。

关于参与式治理的特征,陈剩勇认为,参与式治理是一个赋权的过程,更加突出“参与”,强调“利害关系人”的权力和责任,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充分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是网络治理。赵光勇认为,参与式治理是参与式民主的应用,是与公共政策利益相关的普通公民的参与,关注公民参与所产生的治理绩效,所要解决的公共问题多是地方性的,并不排斥政府的主导作用。

关于参与式治理的意义,张紧跟认为,参与式治理既提高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又改善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赵光勇认为,参与式治理不仅有助于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而且有助于普通民众获得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sup>[20]</sup>

总之,参与式治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分权化和选举民主化治理改革的失败而产生的。虽然在国际和国内有了一些实践,如巴西的参与式预算、南非的工人合作治理,中国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参与式预算,还有上海闵行、河南焦作、黑龙江哈尔滨等地的参与式预算改革试



点,但参与式治理在我国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还面临着诸如公民社会发展不充分、治理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冲突等许多问题,需要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等方面加大探索力度。

### (三) 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是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公民参与,强调公民信任、互惠、合作等精神的培育和养成,其实践导向主要是地方和基层的公民参与,如社区参与等。如果说参与式民主理论和参与式治理理论是从国家和政府层面来研究公民参与问题,社会资本理论则是从社会层面来研究它。

关于社会资本的涵义,虽然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多数学者还是比较认同罗伯特·D·帕特南的说法,认为从社会学角度来说,社会资本具有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的网络,它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效率。<sup>[21]</sup>有学者从社区参与视角研究了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的关系,认为公民参与是在社会资本形成中占据核心地位,而社会资本对社区发展和社区公民参与起着明显的促进或制约作用。<sup>[22]</sup>有学者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意识的关系,发现参加志愿组织、官办组织和社会宽容、信任熟人对公民参与意识的影响不同。<sup>[23]</sup>还有学者研究了社会资本的功效,社会资本的功效存在着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既有正面功效,也有负面功效。<sup>[24]</sup>还有学者采用社会学和行政学交叉的研究方法,分析了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社会资本与发展协商民主的关系。<sup>[25]</sup>这些都是有价值的新的研究取向。

## 三 公民参与的方式以及问题和对策

### (一) 公民参与的方式

公民参与的方式,广义上包含了公民参与的形式、途径、类型等提法,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之进行了分类研究。

一是从公共服务的决策和提供两条路径出发,将这个领域的公民参与分为六种类型,即决策阶段的告知型参与、有限吸纳型参与和决策型参与,以及提供服务阶段的校正型参与、改善型参与和合作型参与。<sup>[26]</sup>

二是从公民参与态度或动机视角,将公民参与分为主动型参与、被动型参与和互动型参与。主动型参与主要包括选举、信访、登录政府网站等合法以及罢工、游行、闹事等不合法方式;被动型参与包括告知、民意调查等;互动型参与包括参加听证会、陪审活动等。

三是从制度视角分为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四是从组织视角分为正式组织参与和非正式组织参与。五是从参与时间视角分为政策制定前参与、政策制定中参与和政策制定后参与。<sup>[27]</sup>

### (二) 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

关于这个方面,学者们主要从公民、政府、社会等不同层面进行了分析。

公民层面:一是公民参与的动力不足、热情不高;二是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不强;三是公民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四是公民参与的能力不足;五是公民参与的理性和法治化程度较低。

政府层面:一是为公民提供的参与渠道不足;二是公民参与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三是政府的回应机制不健全,缺乏回应动力、回应方式陈旧、回应效率有待提高、回应向度单一等;四是监督机制不健全,普通公民缺乏监督条件和信息,公民监督立法滞后,公民监督制度不完善;五是政府推动公民参与的责任动因不强;六是信息沟通上重被动回应而轻主动宣传等。

社会层面:一是公民参与的文化落后,公民文化有待发展;二是由于受“精英决策”的影响,公民参与的普遍性、公共性、代表性有待提高;三是公民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不高,公民社会的培育任重道远;四是公民参与的效果不明显,离善治的要求有距离等。<sup>[28]</sup>

由此可见,学者们在研究各个领域的公民参与过程中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如何发现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论证还不甚严密,还需要相关数据资料来支撑。

### (三) 推进公民参与的对策

总体来说,学者们对于这方面主要是从公民、政府、社会三个层面来探讨的。

公民层面:一是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塑

造公民参与精神；二是注重公民参与能力技术的培养和提高；三是扩大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四是通过充分发动，提高公民参与热情。

由于政府掌握着公共权力，在推进公民参与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在政府层面提出的对策或建议比较多：一是提升政府的理性认识，承认利益博弈，但需放弃对手思维；二是建立健全公民参与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如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信访制度、党内民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三是重塑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加强两者的互动；四是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健全公民利益表达机制；五是提高引导公民参与的技能；六是增强政务的公开透明，保障公民参与监督的权利；七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由控制和管理转向多中心的现代治理等。

社会层面：一是加强公民社会培育，推进以民间组织为主体的组织化参与；二是以增进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公民参与为突破口；三是积极构筑公民文化，推进公民身份建设；四是提高非政府组织的主体地位、公信力和动员能力；五是重视公民的网络参与，实现参与主体多元化。<sup>[29]</sup>

学者们提出的诸多建议，对于今后进一步推进公民参与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也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有些建议还仅停留在提一提的层面上，至于如何落到实处，还需要进行精细化研究；二是对于公民参与的程度和范围需要有一个理性认识，并不是各个领域的所有事项都需要公民参与，并不是公民参与的程度越高越好，需要有序适度参与，不能像“文革”期间的群众运动那样走向极端。

#### 四 总结与展望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明显看出，新世纪以来，我国公民参与研究有两个明显特点：

##### （一）研究范围不断拓展

一是研究对象的外延在扩大。较之以前的公民政治参与、公民行政参与和公民社区参与三大主要研究领域，新世纪以来，我国公民参与研究对象的外延不断扩大，除了继续进行政治参与和行政参与的研究外，社区参与研究已

扩展为社会参与研究，另外还涉及到了党的建设参与、经济建设参与、文化建设参与，甚至军事、国防、外交参与等方面的研究。

二是研究对象的内涵更加丰富。表现为：第一，参与主体方面研究更加精细化，包括大学生、私营企业主、青少年、边疆民族地区、网民、农民、农民工、农村妇女、港澳台少数民族裔、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第二，参与具体领域研究更加多样化，包括各种政治参与、非理性参与、政府绩效评估参与、农村和社区治理参与、雾霾治理参与、公共服务参与、公共预算参与、网络参与、法治建设参与、民生建设参与等等。

##### （二）研究方法日益丰富

当前，学者们在研究公民参与现状问题时，所采用的最主要研究方法仍然是理论研究法，进行定性分析。其研究思路一般是先引介西方相关的公民参与理论，再对照中国公民参与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根据西方理论要求提出解决对策。

但另一方面有三点值得重视：一是案例研究迅速增加，涉及到的案例如“浙江温岭”“汶川地震”“厦门PX项目”“乌坎事件”“上海磁悬浮列车”“江苏睢宁‘三问三请’”“凤凰古城门票事件”以及以各个省市为例等；二是定量分析越来越多，调查对象包括“上海PD地区”“山东济宁”“大学生公民参与状况”“上海松江垃圾焚烧项目”等。当然，采用调查研究方法的论文还是少数；三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对公民参与策略和模型的引介和构建，代表性的有“理性行为模型”“双性化模型”“ACSI模型”“CIPA模型”以及詹姆斯·克雷顿（James L. Creighton）按参与目的分类的策略、约翰·克莱顿·托马斯（John Clayton Thomas）的有效决策参与策略、劳伦斯·沃特斯等人（Lawrence C. Walters）开发的目的一问题参与策略等。<sup>[30]</sup>

新世纪以来，尽管我国学界在公民参与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需要今后进一步补齐短板。

（一）要加强公民参与本土话语体系的构建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目前国内公民参与研究还是在西方话语体系下展开的,引介西方理论、概念、范畴、表述的做法还很普遍。今后需要研究者增强本土意识,立足我国公民参与实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适应时代、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公民参与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和理论体系。同时,还要加强本土公民参与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加强与世界话语的交流,增强其国际影响力,以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中国话语权。

#### (二) 要加强具体案例研究和定量研究

通过上面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虽然这两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绩,但总体还比较薄弱。在研究方法和路径上,学者们还是注重从宏观层面进行理论研究和定性分析,且重复现象较多。而微观层面的典型案例研究,有助于积累公民参与的知识和经验,有助于切实推进国内的公民参与,其研究意义重大。因此,需要研究者更多地走出书斋,深入国内公民参与的丰富实践,融合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统计学等相关知识,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深入调查,创造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 (三) 加强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精细意识

如上所述,很多研究仅满足于对公民参与现状的理论描述,而对隐藏于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较少论及。比如政府为什么鼓励和引导公民参与,公民为什么要参与等问题,需要进行严密论证。再就是研究对策需要精细化。学者们往往会泛泛提出一些推动公民参与的对策,但如何落到实处,往往不再深入研究。比如提高公民参与的能力,具体怎么提高,无从得知。

#### (四) 要拓宽公民参与领域的研究

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公民参与的领域和范围越来越广。因此,除继续加强对公民政治参与、行政参与和社区参与的研究外,还需加大对公民网络参与、法治参与、环境参与、治理参与、党建参与、军事和国防参与、外交参与等领域的研究。比如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服务型政党建设任务的提出,需要加强对公民参与服务

型政党建设的研究等。

#### 注释:

[1] 蔡定剑:《公众参与:风险社会的制度建设》,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2] 陈芳:《西方公民参与策略的模型及其检验》,《东南学术》2011年第5期。

[3] 石路:《政府公共决策与公民参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页。

[4] 蔡定剑:《公众参与:风险社会的制度建设》,第10页。

[5] 余逊达:《公民参与与公共民生问题的解决:对杭州实践的研究和思考》,《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宋煜萍、陈进华:《论改善民生中的公民参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1期。

[6] 蒋传光:《公民身份与公民参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要素》,《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7] 王立京:《中国公民参与制度化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1页。

[8] 宁有才、梁栋:《当前我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济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郭小聪、代凯:《近十年国内公民参与研究述评》,《学术研究》2013年第6期。

[9] 徐琳、谷世飞:《公民参与视角下的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党秀云:《论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10期。

[10] 闫冰:《我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动力和价值分析》,《魅力中国》2010年第1期。

[11] 宋煜萍、陈进华:《论改善民生中的公民参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1期;闫冰:《我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动力和价值分析》,《魅力中国》2010年第1期。

[12] 吴玉宗、张鹏:《试论县级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公民参与——以温岭为例》,《行政与法》2012年第11期;郎友兴、喻冬琪:《公民参与能否带来治理绩效?——以温岭市为例》,《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6期;陈剩勇、吴兴智:《公民参与与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以浙江省温岭市民主恳谈会为例》,《学



术界》2007年第5期。

[13] 汤志伟、邹叶荟：《基于公民参与视角下邻避冲突的应对研究——以广东省茂名市PX项目事件为例》，《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张效羽：《环境公害设施选址的困境及其化解——以宁波市镇海PX项目争议为例》，《行政管理改革》2012年第12期；刘明：《略论行政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以厦门PX项目建设为例》，《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余超文：《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逻辑必然与现实对接——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项目为视角》，《行政与法》2011年第3期；雷颖剑：《公民参与对推进公共决策民主化的作用论议——以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为例》，《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14] 陈尧：《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启示》，《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1期。

[15] 熊宇：《参与式民主：网络时代行政法治的新范式》，《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16] 董石桃：《寻求民主发展与公民参与的统一——一种参与式民主的进路》，《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3期。

[17] 陈炳辉：《弱势民主与强势民主——巴伯的民主理论田》，《浙江学刊》2008年第3期；王锡铤：《公众参与：参与式民主的理论想象及制度实践》，《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6期。

[18] 陈尧：《从参与到协商：当代参与型民主理论之前景》，《学术月刊》2006年第8期；胡伟：《民主与参与：走出貌合神离的困境？——评卡罗尔·帕特曼的参与民主理论》，《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1期。

[19] 刘训练：《公民与共和——当代西方共和主义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06年，第93页。

[20] 陈剩勇、赵光勇：《“参与式治理”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8期；张紧跟：《参与式治理：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创新的趋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赵光勇：《参与式治理的实践、影响变量与应用限度》，《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21] 罗伯特·D.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5页。

[22] 夏晓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1年，第24、144页。

[23] 孟天广、马全军：《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意识的关系研究——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实证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3期。

[24] 栾绍兴、郭雅芬：《社会资本理论探析》，《行政论坛》2009年第3期。

[25] 陈述飞：《社会资本视野下的政府治理问题考量》，《理论导刊》2014年第8期；韩慧、张跃颁：《社会资本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济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26] 汪锦军：《公共服务中的公民参与模式分析》，《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4期。

[27] 宋林霖、代红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理论述评》，《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28] 王琳：《廉政政策执行监督中的公民参与》，《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何霜梅：《善治视野下的公民参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白德全、梁敬斋：《我国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李敏：《城市化进程中邻避危机的公民参与》，《东南学术》2013年第2期。

[29] 宋林霖、代红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理论述评》，《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李敏：《城市化进程中邻避危机的公民参与》，《东南学术》2013年第2期；马长山：《非政府组织中的公民参与》，《求是学刊》2009年第1期；王琳：《廉政政策执行监督中的公民参与》，《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0] 陈芳：《西方公民参与策略的模型及其检验》，《东南学术》2011年第5期。

责任编辑 李铁牛